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
山西的學術圈對傅山學術與書法的影響

白謙慎
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

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在山西境內形成了一個帶動清初學術風氣的學術圈。這個學術圈以明遺民學者爲主體，但也有少數任職清政府的漢族官員。山西學者傅山不但是這個學術圈的重要一員，他本人晚年的學術旨趣乃至書法思想也頗受這一學術圈的影響。本文就這一學術圈的構成，它的主要學術關懷與活動，以及它對傅山晚年學術思想與書法可能的影響作一探討，並以此爲基礎對清代學術和書法藝術（特別是碑學書法）之間的關係做進一步的闡釋。

一

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初，鄭成功領導的反清復明的軍事鬥爭失敗後，明遺民的反清活動進入低潮。在軍事和政治的抗爭已告無望時，明遺民們把自己的精力投入研究歷史和經典，探討歷史興衰規律，維護漢族的文化優勢，使「漢雖亡而漢人之心不亡，」① 以期有朝一日，能夠重新恢復漢族的統治。正如顧炎武（1613—1682）所說：「君子之爲學，以明道救世也。．．．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② 顧炎武五十歲時，正在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初。

從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一個對清初學術風氣起了重要影響的學術圈逐漸在山西境內形成。構成這一學術圈的學者，並不都是山西學者，更準確地說，主要不是山西學者。山西以其特殊的歷史地理位置，在此時恰巧成了來自南北的學者們聚會的地方。（圖1）

這個學術圈主要由傅山、顧炎武、潘耒、閻若璩、曹溶、朱彝尊、陳上年、李因篤、戴廷栻、王弘撰等人組成。

---

① 屈大均：〈書孝獻皇帝紀後〉，載《翁山文外》（吳興劉氏刊本，1920），卷9。

② 顧炎武：〈與人書二十五〉，《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03。

傅山（1607－1684）是清初山西最有影響的學者。從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後，傅山結束了滿清入主中原後最初幾年動蕩不安的流寓生活，定居在太原城郊外的松莊。南來北往的學者們，凡路經太原的，大都過松莊拜訪傅山。作爲本地學者的領袖，傅山自然地成爲了山西學術圈中的核心人物。

作爲清初最重要的學者、思想家，顧炎武無疑是當時山西學術圈的另一個核心人物。自甲申國變後，顧炎武多次北遊。他一生的最後二十餘年，基本上是在北方度過的。1662 年冬，他來到山西，次年年初訪傅山於太原。這以後，他經常旅居晉、陝一帶。他在山西居住較長的地方有代州、汾州、祁縣、靜樂、曲沃等。他晚年曾「欲作書堂於西河（汾州）之介山，聚天下之書藏之，以貽後之學者。」③　顧炎武到山西後，他的門人潘耒（字次耕，1646－1708）也在七十年代初來到山西。

在年齡上比傅山和顧炎武要小一輩、但對清代學術影響極鉅的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先生，1636－1704）也在 1663 年左右來到太原。閻若璩祖籍山西太原，自其七世祖始，遷居江蘇山陽。閻若璩到山西的原因是，「自遷淮以來，高曾以下，類先就僑籍考試，然後歸本籍。故是年附太原縣學，隨補廩膳生。」④　閻若璩的父親閻修齡（字再彭，號牛叟，晚號丹荔老人，1617－1687）是傅山的老友。1656 年傅山南遊過山陽時，就館閻修齡家。⑤所以，閻若璩到太原後，立即訪傅山於松莊。在他的詩文中，也有不少和傅山討論學問的文字。以後，爲應太原鄉試，閻若璩又曾數度抵山西，並過顧炎武於太原，與其辯論學問，深爲顧氏推重。⑥

在當時山西的學術圈中有兩位清政府的漢族官員值得注意。他們是曹溶和陳上年。

③ 徐乾學、秉義、元文：〈爲舅氏顧寧人徵書啓〉，見存萃學社編集《顧亭林先生年譜彙編》（香港：崇文書店，1975）頁366。

④ 張穆：《閻潛邱（若璩）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卷1，頁25。

⑤ 參見尹協理編著〈傅山年譜新編〉，載《傅山全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1冊，頁5303－5304。

⑥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乾隆十年眷西堂刊本）卷6上、卷7。

曹溶（1613－1685），字潔躬，號秋岳。浙江秀水人。崇禎十年（1637）進士，官至御史，入清後仍原官。康熙元年（1662），曹溶出任山西按察副使兼大同兵備使。曹溶和傅山很早就相知。1654 年，傅山因涉嫌參預反清活動被捕入獄。案子報到三法司後，三法司中的漢族官員極力爲之迴護，使傅山終於在 1655 年無罪獲釋。而當時擔任左副都御使的曹溶就是參加營救傅山的清政府官員之一。曹溶在學術方面並無令人矚目的建樹，他的才華主要表現在文學方面，是清初著名的詞人。他同時是清初著名的金石書畫收藏家和藏書家。以其在當時的地位，他更多的是扮演了學術贊助人的角色。

曹溶到達山西後不久，另一位秀水學者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1629－1709）也來到大同，客曹溶幕。無論是在清初的學術界還是文壇，朱彝尊都是一個極重要的人物。他的學術成就主要在經史與金石學的研究方面。

另一位充當學術贊助人的清政府官員是陳上年（字祺公，保定府清苑人，順治六年進士）。陳上年在順治十六年（1659）出任涇固道兵備，次年轉任山西雁門道兵備使。陳上年本人並沒有什麼學術著作，但他在當時西北地區的學者們中很有口碑，被認爲：「居官有才有守，而豁達大度，不可一世。政事之暇，博覽群籍，尤好交遊，慷慨然諾，有古人之風。」⑦　和曹溶一樣，陳上年是以學術的贊助人的身份出現在當時山西學術圈的。⑧　陝西富平學者李因篤（字天生，改字子德，1631－1692）就一直客陳上年幕中，也因之成爲山西學術圈中的重要一員。

當時西北地區兩位重要的收藏家戴廷栻和王弘撰也和上述學者有密切往來。戴廷栻（字楓仲，山西祁縣人，1618－1692）是傅山的至交。戴在學術上雖無可觀的成就，但他「有心計，爲人在儒俠之間，」⑨　是一個有干才

⑦ 王弘撰：《山志》（東京：朋友書店1975年影印紹衣堂藏乾隆53年刻本），1集，卷1，頁23b。

⑧ 顧炎武〈鈔書自序〉云：「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子不云乎：'多見而視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顧亭林詩文集》，頁33。陳上年對學術活動得贊助，由此可見一斑。

⑨ 傅山：〈明户部員外止庵戴先生傳〉，《傅山全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1冊，頁3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文人和金石書畫收藏家。傅山的學術研究常倚重戴廷栻幫助。顧炎武客山西時，戴曾專門爲其在祁縣南山建造了書堂，提供學術研究的物質條件。⑩ 王弘撰（字無異，一字文修，號山史，華陰人，1622－1702）「富收藏，金石文字率多舊搨，故善隸、草書。」⑪　王弘撰和顧炎武、李因篤爲好友。顧入陝時，常館王弘撰家。

在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還有一些明遺民來到山西，成爲我們所討論的學術圈中的人物，如廣東番禺的詩人屈大均（字翁山，1630－1696）、河北永年申涵光（字鳧盟，1619－1677）等。他們雖無驚人的學術建樹，但是他們卻在南來北往之中，傳播學術信息和動態。如閻若璩就曾託屈大均把他的著作《尚書古文疏證》藏之廣東。⑫　清政府在山西的其他一些地方官僚（如山西左布政使王顯祚、太原守令周百計等）也不同程度地給予學者們各種幫助。他們對有成就的學者的禮遇、推崇和贊助，當是維繫山西學術圈的另一重要條件。

關於爲何在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有這麼多學者跑到山西、陝西的原因，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問題。馬曉地先生在解釋這一歷史現象時，認爲明遺民在這時是抱著反清復明的目的來到西北的。⑬　他徵引了清史專家鄧之誠的下述看法：

⑩ 李因篤：〈答戴二楓仲見懷兼申別緒五首〉之三自注云：「顧亭林將起山堂祁之南山，戴力任之」。《受祺堂詩集》（康熙三十八年田少華刊本），卷18，頁4a。

⑪ 轉引自吳懷清撰、陳俊民校編《關中三李年譜》所引《同州志》、《國史儒林傳》（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333－334。

⑫ 《尚書古文疏證》，卷4，頁54a。

⑬ 馬曉地：〈唱盡哀笳出塞歌－清初明遺民詩人在西北邊地之生活與創作〉，載《東洋學》第64號（1990），頁60－78。

> 蓋明之邊兵多有存者，姜瓖之變，募邊兵攻戰，期年清人不能克。李因篤、屈大均走塞上意即在此。⑭

馬先生還引用了鄔慶時《屈翁山年譜》引其田屈鳳竹語來證明這一點：

> 先生（指屈大均）知山陝之間，僻處一隅，清人不甚防閒，有志之士多匿處以圖恢復，因與杜蒼舒入陝聯絡。顧亭林、李天生、朱竹垞、傅青主等先後集太原，定計分進。⑮

馬曉地先生的看法頗能反映以往一些史學家在研究清初遺民們在西北地區活動的基本觀點。但這一看法似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如陳上年這個人物，是李因篤、顧炎武、屈大均和傅山的好友，曾給予當時活動在西北的明遺民們很多的幫助。而陳上年在 1663 年清政府的考績中晉大夫第一時，李因篤曾有詩相賀，盛贊其爲清保邊的功績。⑯　康熙年間，吳三桂在廣西稱帝，陳上年當時正任廣西布政司參議。吳三桂攻陷梧州後，強迫陳上年到其政權中爲官，陳不從，被囚致死。⑰　由此可知，陳對清廷還算是一片忠心的。明遺民們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達的復明願望在多大的程度上被實際地付諸行動，是一個值得認眞研究的問題。愛國詩篇和愛國行動（特別是軍事行動）是兩件有關係但又很不相同的事情。在近一、二十年來的清史研究中，一些中外學者已甚爲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顧炎武等北遊和所謂武裝反清並無直接的關係。⑱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⑭ 鄧之誠先生的這一看法，見其編著《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新一版），上冊，頁2。

⑮ 同注⑬，頁60。

⑯ 李因篤〈伏喜祺公先生考績晉大夫第一恭賦七言排體五十韻〉有句云：「高霞忽聚燕門前，大國風流說穎川。父老同心欣保塞，朝廷一意委承邊。」《受祺堂詩集》，卷6，頁3a。

⑰ 《畿輔通志》，卷230，〈列傳38〉（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第6冊，頁8093。

⑱ 參見Willard Petterson, "The Life of Ku Yen-wu,1613-168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 (1968),114-156; 29 (1969), 201-247;王春瑜，〈顧炎武北上抗清說考辨〉，《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4期，頁35-50。

但不管上述學者們是抱著什麼樣的目的來到西北地區，他們在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山西形成了一個活躍的學術圈確是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在這個學術圈中，有清初學術的重鎮，精明干練的學術與藝術的贊助人，著名的詩人和活躍的收藏家。而他們的學術研究與藝術活動，對清初學術風氣和審美趣味的轉變，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二

清初是學術風氣發生重要轉變的時期。明代傾向形而上的主觀內省式的學術風氣在清初逐漸被崇尚樸實、注重實證考據的學風所取代。在這一學術風氣的轉變中，音韻學、金石學和考據學等學術領域成爲清初學者們的精力所聚之處。活動在山西學術圈的學者們在這幾個領域中都作出了極爲重要的貢獻。

音韻學之所以在清初受到學者們的重視，除了明代一些學者對古音學研究的影響以及明末西方拼音方法傳入的刺激外，⑲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經史的研究成爲學術的主流後，音韻文字被認爲是通經史諸子百家的途徑。顧炎武在致李因篤信中關於音韻學在研究經學和子學中的作用的一段話，經常爲學者們引用：

>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⑳

顧炎武又云：

> 詩三百篇即古人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㉑

把音韻學的研究提高到通經史諸子百家的高度來認識，是清初學者致力於音韻學研究的根本原因。而這點給以後的語文學的發展以深遠的影響。㉒

⑲ 參見張世祿著《中國音韻學史》第8章〈明清時代的古音學〉及第9章〈近代中國音韻學所受西洋文化的影響〉中有關內容。(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下冊，頁261—363。

⑳ 顧炎武：〈答李子德書〉，《顧亭林詩文集》，頁76。

㉑ 顧炎武：〈與人書(四)〉，同上，頁95。

㉒ 胡奇光先生在討論小學指導思想在清代發生的根本轉變時指出：「從許慎到段王一千七百多年間，我國語文的指導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從主張字形爲依據闡明本義到以聲韻爲關鍵進行名物訓詁。」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231。這一

在當時山西學術圈中，有數位學者長於音韻學，其中顧炎武是無可爭辯的前驅。康熙五年(1666)顧炎武完成了《韻補正》。次年顧炎武至山陽刻其音韻學代表作、堪稱清代古音學奠基石的《音學五書》。同年，在陳上年的資助下，顧炎武在山陽重刻《廣韻》這部中國音韻學史上最爲重要的韻書。㉓ 顧炎武在〈書《廣韻》後〉寫道：

> 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賁，卄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犀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蓋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㉔

顧炎武的這段話表明，是時傅山也在研究音韻學，並曾和顧炎武交流過彼此的心得。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例證是，北京圖書館藏有傅山批注的顧炎武重刊的《廣韻》。(圖 2)從書後祁寯藻的跋文可知，此書極可能就是顧炎武贈送給傅山的。由於《廣韻》爲北宋時陳彭年等所修增廣隋代陸法言《切韻》的韻書，保存了許多宋以前漢字的讀音。傅山在批注《廣韻》時，以唐代詩人杜甫的詩中的韻尾來核對《廣韻》所收字之讀音。《廣韻》收字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而根據汪世清先生的統計研究，傅山在批注《廣韻》時所引杜甫詩句多達一萬餘句。尤爲令人欽佩的是，傅山在《廣韻》上按韻手批的杜詩句，均爲默寫而出，並非照書鈔來。其博聞強記，讀書用功之深，由此可見一斑。㉕ 從新近出版的《傅山全書》中收錄的傅山關於文字訓詁的一些札記中可看到，他經常徵引的字書和韻書有：《玉篇》、《廣韻》、《方言》、

轉變，應在清初就已開始。

㉓ 王弘撰《山志》云：「李子德嘗得《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木淮陰。」見2集，卷4，頁18a。

㉔ 《顧亭林詩文集》，頁116—117。

㉕ 傅山批注《廣韻》，已由汪世清先生輯錄爲《傅山〈廣韻〉杜詩句匯批》一書交付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梓行。此處所引，乃汪世清先生在1995年12月14日給筆者的信中所提供的信息。在給筆者的另一信中(1995年6月23日)，汪世清先生指出：「傅山按《廣韻》手書杜詩摘句，似即爲其韻學研究之一端，或亦其獨創之一種研究方法，殊堪注意。」「從摘錄杜句以使《廣韻》之研究深入一步，此亦傅山之功。」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 期刊資訊網

《說文解字》、《篇海》、《釋名》、《韻會舉要小補》、《洪武正韻》、《集韻》、《干祿字書》、《隸釋》、《爾雅》、《廣雅》、《一切經音義》等。這些也正是顧炎武在他的著作中經常徵引的書籍。這些都說明了在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傅山的研究興趣和顧炎武的學術關注有相當的共同處，這當是互相影響的結果。

清初學者研究音韻學的目的是爲了訓詁古代的名物制度。台灣袁守謙先生藏有一本傅山寫於 1669 年的一本行書冊頁，內容是關於〈子虛賦〉的訓詁。在訓讀〈子虛賦〉時，傅山使用的方法之一便是以聲韻來通訓詁。這和顧炎武所宣稱的「考文自知音始」的學術主張是完全一致的。

山西學術圈中的兩位年輕的學者潘耒和李因篤也長於音韻學的研究。潘耒著《類音》一書，對漢語的音理作了十分精細的研究。李因篤也曾著《古今韻考》，然主要是推闡顧炎武的古音學說。不過，顧炎武的《音學五書》也多處參考了李因篤的研究成果。顧炎武在《音學五書》後序中曾說：「《詩本音》十卷，則李君因篤不遠千里來相訂正，而多采其言。」㉖ 另一位年輕的學者閻若璩雖以考證見長，對音韻學亦有興趣。他的詩句「回首松莊稱韻學」㉗ 當是他和傅山在松莊討論音韻學的眞實紀錄。

在當時正在興起的幾個學術領域中，和書法藝術關係最爲直接的是金石學的研究。山西學術圈中的許多活躍的成員，都是清初金石學復興活動中的中堅人物。金石學在清初的復興，本非由書法藝術創作的需要所引起，而是由於金石文字保留了第一手的原始史料，可資考訂經史之用，因此引起當時的學者們的高度重視。這一點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序〉說得很清楚：

>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鎭、祠廟、伽藍之蹟，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奊朽壞，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㉘

㉖ 顧炎武：〈《音學五書》後序〉及〈後序〉，見《音學五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4—5。

㉗ 閻若璩：〈訪馬長逸〉，《潛邱箚記》（乾隆十年眷西堂刊本），卷6。

不但顧炎武，曹溶和朱彝尊也同樣有訪碑蓄碑之好。曹溶是清初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曾編《金石表》著錄其收藏。㉙ 而朱彝尊則是「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㉚ 朱彝尊曾著《曝書亭金石跋尾》六卷。曹溶和朱彝尊在山西期間，多次策蹇訪碑。和曹朱同時代的金石學家葉奕苞在《金石錄補》中有這樣的描述：

> 錫鬯（朱彝尊）同曹侍郎（曹溶）歷燕晉之間，訪得古碑，不憚發地數尺而出之。從者皆善摹搨及裝潢事。文人好古，近罕儔匹。㉛

在曹溶的《敬惕堂集》和朱彝尊的《曝書亭集》中，有許多關於訪碑搨碑的詩文。如《敬惕堂集》中的「資耀寰入秦托其搨寄碑本」和〈遣骨至曲陽搨北嶽廟碑〉等詩。顧炎武因曹溶有蓄碑之好，曾寄贈漢唐碑刻搨本，曹有〈得寧人書寄漢唐碑刻至〉一詩紀其事。㉜

王弘撰是明末著名的金石學家郭宗昌（？—1652）的忘年交。郭宗昌的著作《金石史》就是由王弘撰於 1663 年在南京刊行的。郭宗昌去世後，他舊藏的一些漢碑搨本也轉入王弘撰之手，如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曹全碑》和《華山碑》。（圖 3）顧炎武在他的《金石文字記》中，提到最多的，就是王弘撰和朱彝尊，可知王弘撰曾和顧炎武一同討論金石文字。

㉘ 《顧亭林詩文集》，頁31。

㉙ 葉奕苞云：「秋嶽先生倦圃收藏古今碑刻名金石表約數百種，倣趙氏例自周秦至五代錄入表中。」《金石錄補》，載《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第12冊，頁9134b。

㉚ 王士禎：「《曝書亭集》序」，見《曝書亭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

㉛ 《金石錄補》，頁9133a。

㉜ 曹溶：《敬惕堂集》（雍正三年刊本）卷6、7。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明亡以前傅山就曾以金石學來考訂史乘。一次在和閻若璩討論謝承的《後漢書》時，傅山說：謝承《後漢書》，「某家有之，永樂間揚州刻本。初郃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㉝ 不過比較系統的、深入的研究則大概在甲申以後特別是 1660 年後。在閻若璩的著作中，記載他和傅山討論金石學的文字最多，當是這一討論給他留下的印象極深：

> 金石文字足爲史傳正訛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其事。㉞
> 傅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㉟

浙江寧波天一閣藏傅山考訂《石鼓文》冊頁是傅山此一時期研究金石學的一個例證。從書法的風格來看，這一冊頁很可能書於 1655 年後。在這本冊頁中，傅山以端正的小楷抄錄了十篇石鼓刻辭，並於每篇刻辭後以更小的字書寫自己的考訂文字。其內容包括比較不同學者對《石鼓文》的隸定釋文，和傅山本人的考釋。所徵引文獻有《石鼓文》石刻本，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鄭樵的《金石略》等，也引用了《玉篇》、《汗簡》、《集韻》、《廣韻》等字書、韻書。從最後一開上傅山的名章來看，此冊頁當爲其考釋《石鼓文》的一個定本。㊱

1935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了傅山點校和批注的明萬曆戊子（1588）刊宋洪适（1117—1184）重要的金石學著作《隸釋》二十七卷（共八冊）。張元濟在跋文中說：「王本雖有疵纇，得傅青主手校而轉增其價值。卷六脫文，卷十九錯簡，傅氏均已校出。」從這本經傅山點校的《隸釋》上的「傅鼎臣」名章來看，（圖 4）傅山收藏這一著作的時間較早（傅山原名鼎臣，後改名山）。但從點校的書法風格來看，則可以肯定大多數的批語書於 1660 年代以後。從

㉝ 閻若璩：《困學紀聞箋》（乾隆三年馬氏叢書樓刻本），卷13，頁2a。

㉞ 閻若璩：〈移寓雜興贈陳子壽先生五十首〉自注，《潛邱劄記》，卷6，頁15a。

㉟ 同上，卷2，頁3b。

㊱ 參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1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290。

書中的批語不難看出，傅山當時讀此書是讀得極爲細致認眞的，在這一時期他曾對漢碑作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傅山關於篆隸在書法藝術中的重要地位的論述，也極可能在這一時期提出。

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傅山在太原附近的住處松莊也是文人學者們聚會討論金石文字的地方。朱彝尊、曹溶等曾在傅山家裡觀賞傅山收藏的碑帖，並爲之題跋。㊲ 訪碑、拓碑、覯碑、研究金石文字並以之考訂經史諸子百家，在清初學者中已蔚然成風。

值得指出的是，在本文所討論的山西學術圈內，傅山和朱彝尊是清初兩位重要的隸書書家。兩人中又以傅山對金石書法的鼓吹提倡最爲積極有力。在現存的傅山的書論中，有相當多的討論篆隸書法的文字。傅山在研究金石文字時，是時時顧及書法的。如他在校注《隸釋》時，就以「古拙風流」四字來描述《泰山都尉孔宙碑》的書法。（圖 5a,b）在傅山本人曾收藏的《曹全碑》和《張遷碑》上，都有傅山評論漢隸書法的批注。㊳ 清初金石學研究的復興對傅山書法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作爲清代學術最主要的特色之一的考證學也同樣在清初就已翕然成風。山西學術圈中的許多學者都長於考據。顧炎武的《日知錄》、閻若璩的《潛邱劄記》就有相當的篇幅是考證經史中記載的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譬如，傅山有一次問閻若璩，古人登席是否既脫屨復脫襪，否則就被認爲失禮。閻當時沒回答出來。數年後，閻在考出這一古代的禮俗變遷後，專門寫信給傅山，告訴他自己的考證結果。㊴ 當時學者們熱衷於考證，固然和他們的經史研究有關。但考證形成風氣之後，它本身又成爲了衡量一個學者的學術功力和水平的標準。一旦這種標準確立，它促使更多的學者按照這種標準去從事學術活動。

㊲ 朱彝尊：〈書尹宙碑後〉：「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道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煙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爲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禡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彝尊書。康熙乙巳秋八月。」《曝書亭集》，卷47。

㊳ 《傅山全書》，第1冊，頁414，420—421。

㊴ 閻若璩：《潛邱劄記》，卷5，頁9a—9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初的考證之風又和當時的辨僞風氣緊密聯繫在一起。㊵ 如果說考證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只是在具體的事物和制度上下功夫的話，辨僞則是把考證的方法用來辨別儒家經典的眞僞。在山西學術圈中，以辨僞聞名的是閻若璩。閻若璩的主要成績在他考證《古文尚書》的眞僞方面。儘管由宋入明一直有學者（如宋代的吳棫和朱熹，明代的梅鷟）懷疑《古文尚書》是一部僞書，但只有到了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才成定案。雖然，閻若璩在 1683 年才完成《尚書古文疏證》的第一卷，全書是在閻若璩去世後由其子閻詠整理出版的，但閻若璩二十歲時（1655 年，即傅山南遊訪閻氏父子於山陽的前一年）就開始懷疑《古文尚書》。㊶ 1672 年，閻若璩就曾在太原就《古文尚書》的眞僞問題和顧炎武進行過討論。顧炎武、朱彝尊本不疑《古文尚書》，後在閻的影響下，對《古文尚書》的態度發生了一些轉變。㊷ 足見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考辨在當時學術界的影響之鉅。

考證和辨僞崇尚的是懷疑與實證的精神。懷疑即不盲從古人古書，實證則言必有據。即使是千載經典、蓋代文豪，都可以成爲懷疑批評的對象。我們經常可以讀到山西學術圈的學者對前代學者的批評。閻若璩曾在傅山面前這樣尖刻地批評歐陽修的學問：

> 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㊸

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對明末最風行的文字學著作、趙宧光的《說文長箋》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 萬曆末，吳中趙凡夫宧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爲淫奔之詩，而爲「衿」即爲「衾」字。（原注：詩中之有「衾」字，「抱衾與裯，錦衾爛兮」。）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

㊵ 關於清初的辨僞風氣，參見林慶彰著《清初的群經辨僞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㊶ 參見張穆：《閻潛邱（若璩）先生年譜》，頁20。

㊷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5上，卷7，頁4b。

㊸ 閻若璩：《潛邱箚記》，卷2，頁4a—4b。

> 尚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於𥳑」（原注：兕下）。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闚。而適當喜新尚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余條正之。㊹

古人和古書可以被懷疑和批評，當代學者及其著述自然不在例外。從當時學者的著作中，我們不難讀到學者們相互指正錯誤的文字。傅山在 1671 年批注《毛詩注疏》時，在「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棗而入，稛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這段上用墨筆眉批：

> 垂棗，《管子》〈小匡篇〉及〈齊語〉皆有之。今行《國語》逕作棗，音古刀反，大誣。宋但泥《左傳》「垂棗」語，不詳文義而音之。近日李天生〈與顧寧人詩作〉五排律中，用「垂棗」字，顧求其疵曰：「是錯用矣，經傳無垂棗之文，但有左氏垂棗。」謂李以「棗」爲「棗」也。何言之易也？余不敢舉此以證，恐忌也。察士無凌之事則不樂。㊺

雖然，傅山說他不願和顧炎武辯論，恐爲顧氏所忌，但顧炎武挑李因篤用詞不當的例子，說明當時的學者們（至少是相當一部份學者）對有關學問方面的事情，是多麼的嚴格乃至挑剔，一個詞，一個字都不輕易地放過。不但顧炎武如此，博聞強記而又喜歡炫耀的考據學大師閻若璩在挑當代人的毛病時，更是不餘遺力，樂此不疲。㊻ 同代人李因篤、汪琬論述中有誤，就被他譏爲「杜撰故事」和「私造典禮」。㊼ 即使是博學如顧炎武，一旦在著述中有錯誤，閻若璩也毫不留情地當面指出。《潛邱箚記》云：

㊹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冊，頁1605—1606。

㊺ 《傅山全書》，第4冊，頁2448—2449。

㊻ 《尚書古文疏證》及《潛邱箚記》中此類的文字很多，此處不一一列舉。

㊼ 閻若璩：《潛邱箚記》，卷5，頁15a—15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顧寧人論幽、並、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余時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並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遊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㊽

在〈南雷黃氏哀詞〉中，閻若璩更進一步談到了他和顧炎武在太原辯論學問的情形：

顧余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㊾

閻若璩比顧炎武小整整一輩，他能和一位學術聲譽極高的前輩論辯，並「持論嶽嶽不少阿，」生動地說明在當時的山西學術圈中，學術氣氛是相當活躍開放的，論辯之風亦興盛一時。這種激烈的論辯造成了一種學術氛圍，處於其中的每一位學者都會因此而感受到一種學術上壓力，這種壓力促使他們更爲謹慎地從事學術活動，並認眞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顧炎武在一通致友人的信札中寫道：

《日知錄》初本乃辛亥年（1671）刻。彼時讀書未多，見道未廣，其所刊刻者，較之於今，不過十分之三。非敢沽名衒世，聊以塞同人之請，代抄錄之煩而已……《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信哉斯言！今此舊編，有塵清覽。知我者當爲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遺諸後人，而不當但爲稱譽之辭也。㊿

㊽ 同上，卷3，頁1a—1b。閻若璩在另一則筆記中提到此事時說：「有爲寧老護法者聞之謂，顧先生必有出處，未可輕議。及愚面詰寧老，果是臆說。人之好名而不務實如此。」（同上，卷4下，頁39a）閻若璩還曾爲顧炎武訂正《日知錄》。錢大昕〈閻先生傳〉云：「崑山顧先生炎武遊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爲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潛研堂集》（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刊本），卷38。

㊾ 閻若璩：〈南雷黃氏哀詞〉，《潛邱箚記》，卷4上，頁34b。

㊿ 《顧亭林詩文集》，頁190。

辛亥年時顧炎武已近六十歲。書寫上引書札時，最早也已在七十年代的後半期了。(51)　在嚴謹的治學精神約制下，已近耆年的顧炎武對自己學術上的一些失誤是耿耿於懷的。這種心情在他致潘耒的一札中表露得更爲坦澈：

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後學。吾之跋《廣韻》是也。雖傅青主讀書四五十年，亦同此見。今廢之而別作一篇，並送覽以志吾過。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處舊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遲遲自有定本也。(52)

顧炎武在信中提到，傅山對學問持有相同的謹愼態度。閻若璩曾寫道：

先生[指傅山]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秘不示人。(53)

傅山作《左錦》約在 1665 至 1675 間。(54)　傅山編著《左錦》一書，部份手稿現藏山西省博物館，部份曾爲美國收藏家 John Elliott 所藏（現藏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從 Elliott 所藏《左錦》手稿筆跡判斷，該手稿書於晚年。從傅山本人的朱筆圈點來看，傅山在晚年仍打算修改此作。因此，閻若璩所謂傅山「秘不示人」，極可能就是出於在學術上愼重的緣故。學者們對己苛求如此，遑論對前人著述中的錯誤的指摘批評。

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山西學術圈中的這種學術風氣不僅對整個清代的學術沿著樸學的方向發展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它對傅山晚年的書法似也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51) 顧炎武在〈初刻《日知錄》自序〉中也有類似的記載：「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尤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顧亭林詩文集》，頁27。

(52) 《顧亭林詩文集》，頁176。

(53) 《潛邱箚記》，卷2，頁14a。

(54)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5上記載：「壬午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壬午年爲1672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

在前兩節中，我們討論了山西學術圈的構成及其主要的學術活動。那麼這些學者之間的交往和學術活動對傅山的書法又有什麼影響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簡略地談一下傅山和他早些時期的書法的一些特點。

以思想性格而言，傅山是一個極爲複雜的人。他的身上充滿著矛盾。他崇尚老莊，但又自稱「道人雖戴黃冠，實自少嚴秉僧律。」[55] 他反對理學以禮法束縛人性，但同時又極重君臣之義，恪守「華夷之辨」的原則。他的思想體係也因之顯得十分的龐雜。思想上的這些特點也反映在他的學術活動中。在甲申國變前，傅山就已抱有著述之志，受晚明思潮的影響，他一方面寫出了「皆反常之論」的《性史》這種與性理相關的著作，[56] 另一方面又編寫了像《兩漢書姓名韻》這種需要相當堅韌的學術意志和扎實的功力的著作。

晚明是一個崇尚標新立異的時代，一個不受成法約束的時代。人們在學術和藝術上標新立異時，常以犧牲嚴肅的學術精神和規範爲代價的。顧炎武就曾痛斥晚明人妄改古書以牽就己意的惡習。[57] 儘管傅山的早期學術活動就顯示出他有相當扎實的一面，但他的藝術卻染有晚明的一些刻意標新立異、師心自造的習氣。原由上海私人收藏的傅山在 1652 年左右書寫的《嗇廬妙翰》手卷，頗能反映傅山藝術性格的這一面。(圖 6a) 在這一手卷中傅山鈔錄了一些筆記和《莊子》之〈天運〉、〈天道〉篇中的部份段落。它的書法有這樣幾個特點：異體字的大量使用；深受幾部字書影響的、既非小篆又非規範的金文的篆書；依靠想象力來臆造的古隸。

[55] 傅山致魏一鼇信札(香港葉承耀醫師收藏)。參見白謙慎：〈傅山與魏一鼇：清初明遺民與仕清漢族官員關係的個案研究〉，載《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期(1996)，頁128。

[56] 《傅山全書》，第1冊，頁778—779。

[57]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萬曆年間人多好竄改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見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第2冊，頁1434—1435。

文人墨客書寫異體字，可謂古來有之。劉葉秋先生曾指出，魏晉南北朝之際，由於地方割據、南北阻隔以及使用文字趨於簡易等多方面原因，異體別字，逐漸增多，秦漢以來文字統一的局面不復存在。北齊的顏推之就批評南北朝士大夫作書妄改筆畫，或自造簡字，於是俗訛、異體不斷滋生，成爲風氣，以至經籍的文字，都不能入目。[58]

儘管書寫異體字以標新立異可以說是代不乏人，但明末清初無疑是繼南北朝後書法家們最有意識地、也最頻繁地使用異體字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一些重要的書畫家如倪元璐、黃道周、王鐸、陳洪綬等都曾多寡不同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異體字。在《嗇廬妙翰》手卷中，傅山不但從《玉篇》、《集韻》、《廣韻》這些楷書的字書和韻書中找出冷僻的異體字來書寫，他還以隸古定的方法，把一些篆書系統文字的字書(如《汗簡》、《集篆古文韻海》、《古文四聲韻》《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收錄的所謂的古文和鐘鼎文字寫入他的行書。這種方法當然也可以找到先例。[59] 不過傅山的這一手卷把明末使用異體字的時尚發揮到了極致。讓我們從這個手卷中選出一段來看看傅山是怎樣使用異體字的。手卷中有行書書寫的兩行文字：「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於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在這二十一個字中，從《說文解字》、《汗簡》等字書中找出的古體字竟多達十四個。(圖 6b)

傅山有時還自己造字。《莊子・天運篇》中有一段西施鄰里一丑婦效顰的故事。原文中的「顰」字在通行的本子中都寫作「矉」，即一立「目」在左，一「賓」在右。傅山寫矉時，將左邊的立「目」橫倒下，把它置入「賓」字的中部。(圖 7a) 在這段文字的後面，傅山用小字寫了一段注：

> 「賓」字諸體無此法。吾偶以橫「目」置「賓」之中，亦非有意如此，寫時忘先豎「目」，既「步」矣而悟，遂而其法(圖 7b)

[58] 參見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83。

[59] 宋人就曾有過這樣的記載：「劉伯英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雜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鵠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參見〈劉正夫論書〉，載崔爾平選編及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161。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傅山最初寫此字時，當然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說，是無意的。但他接著又以同樣的方法連寫三次，說明他對自己的發明，頗爲得意。注中「遂而其法」四字，反映出傅山實在是很瞭解，古代的許多異體、俗字也是當時人的發明，被人們寫入字書，也就取得了眞實存在的「字」的地位了。既然古人可以造字，憑什麼今人就不能造呢？傅山不但造了，他還坦率地把這點告訴人們。傅山之不拘成法，可見一斑。

《嗇廬妙翰》手卷中的隸書亦頗多臆造。比如說「諸」字，傅山寫作「彡」。他把《汗簡》中「諸」字，用隸書的筆法寫出來，也就算它是隸書了。(圖 8)他並不在乎它是否合乎古代隸書的體例。

在關於先民創造文字的種種傳說中，「八卦」被認爲是文字的原始淵源之一。這在許愼的〈《說文解字》敘〉、傳孔安國〈《尚書》序〉都以簡略的文字暗示八卦和文字起源有密切的關係。⑹⓪ 在《易緯》〈乾・鑿度〉中，這種關係更被具體化了：

> ☰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火字，☵古文水字，☳古文風字，☴古文雷字，☶古文山字，☱古文澤字。⑹①

傅山在他的隸書中把這種傳說中的文字直接地寫了進去。並認爲他這樣寫隸書，十分古樸：

> 此法古樸，似漢之（筆者按：此處疑有脫字），此法遺留少矣。《有道碑》僅存典刑耳。(見圖 8)

傅山的這段小注，說明他那時對漢隸的理解是充滿想像力的。《有道碑》即《郭有道碑》，或《郭林宗碑》。康熙十二年（1673）傅山曾應介休人士的邀請，重書郭有道碑陰。他爲此有一段文字專門討論《郭有道碑》：

⑹⓪ 參見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載《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92—98。

⑹① 轉引自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同上。

> 洪景伯《天下碑錄》此碑有二。一曰：《郭有道碑》，蔡邕文並書，在太原平晉龍泉側；一曰：《郭林宗碑》，在介休墓側。今所謂龍泉者，並其地而迷之。其墓側但有元人眞書謄其文耳。其《隸釋》及《集古》、《金石錄》皆不列此文，唯引《水經注》有之，而作「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哀悼作「哀痛」，與今文少異。每疑景伯在南渡後，不得收北碑有之，而歐、趙二錄在北宋亦不列此，何也？洪於《水經注》所列碑後云：「其碑今不毀者，什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乃知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得矣。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前篆書頗可可，而碑字甚陋，至於篤、鴻、焉、爲、庶下皆作「火」，尤鄙陋可笑。不知口口公所賞識以爲漢碑者，又爲何本？或非吾所見者耶？⑹②

正如傅山所說，《郭有道碑》在北宋時就「已不可得矣，」可爲何他在書寫《嗇廬妙翰》手卷時還要說有「道碑僅存典刑」呢？這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早年從友人曹偉處得到一本後人補書的《郭有道碑》搨本時，誤以爲是漢碑原搨。他所說的「《有道碑》僅存典刑」云云，是對那本搨本發的議論。另一種可能是，傅山在書寫這一手卷時，已知《郭有道碑》早已不在人間，他想像《郭有道碑》尚存古樸之法，以早已失傳的漢碑來爲自己臆造的隸書來辯護。不管怎麼說，傅山這一手卷中的隸書，臆造的成份極多，無論從文字學還是漢隸書法的角度來看，都經不起嚴格的推敲。

《嗇廬妙翰》手卷中還有用篆書書寫的部份。(圖 9)我們很難說，這一部份篆書是小篆還是金文，我們只能籠統地稱之爲篆書。這大概是傅山所理解的籀文。它的來源很雜，有的取自我們前面提到的幾本宋人編的字書，有的是《說文解字》中紀錄的古文。

⑹② 傅山〈書補郭林宗碑陰〉，《傅山全書》，第1冊，頁404—405。傅山在晚年的一條論書筆記中也寫道：「郭有道碑壞久矣。家藏一本不知爲誰贋作。」載《書法叢刊》，1997年第1期，頁57。康熙版《介休縣志》〈古蹟〉下〈郭有道墓〉條云：「……蔡中郎撰墓碑，年久湮沒。萬曆二十年郭青螺過介補書。康熙二十年傅山復補書。康熙三十年知縣王埴復囑金陵鄭簠補書，余禹民勒立。」轉引自何寶善著《漢郭有道碑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55—56。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在 1650 年代，傅山是經常使用異體字和宋元人字書中一些冷僻的或出處不明的篆字的。譬如書於 1655 年的〈妙法蓮花經〉，(圖 10) 以及大阪市立美術館所藏北宋燕文貴山水卷的引首，(圖 11a,b) 都有這種情況。特別是燕文貴山水卷的引首上的篆書，傅山書寫「山」字爲「㠯」。這個字是從南宋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上著錄的一件所謂的夏戈上的銘文中取來的。(圖 12) 薛尚功不識此文，但有的金石文字書籍釋爲「山」。(圖 13a,b) 傅山也就把它拿來用來署名款。這個字究竟能否讀作「山」，實在是值得商榷的。[63] 民國初年的學者常贊春曾評曰：「先生楷書不落唐人範圍，世有定論。若古篆，則彼時僅有郭恕先氏《汗簡》，至於《鐘鼎字原》等，清代小學金石盛行，率詆爲失眞矣。然在先生時，烏能執彼爲說也！」[64] 不管怎樣說，今天看來傅山當時的篆書在取法方面是大成問題的。傅山所書寫過的古體字，有一些很可能直接取自《集篆古文韻海》這本字書，如他寫「使」爲「㚔」，《集篆古文韻海》即有這種寫法。(圖 14)《集篆古文韻海》收古字極多且全爲古體，但都沒有給出處，且多有不合六書之處，問題很多。[65]

但這一現象可能在傅山的晚年有一定程度的改變。如前所述，在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山西學術圈中，有一些學者是清初樸學和考證學的奠基人和大師。樸素、紮實、言必有據是他們學術的基本的也是共同的風格。一個觀點的提出，一個詞甚或一個字的使用，都必須有所依據。即使是引用前人的某種說法，也不能簡單地沿襲，而是要能論證前人的說法是否足以爲據。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隨便地從古代的字書和韻書中挑出一些冷僻字而不加以考釋便寫入自己的作品，是極容易授人以柄的。作爲山西明遺民的精神文

[63] 裘文俊先生釋此字爲「侯」。參見其提交1994年常熟中國書法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鳥鳳龍蟲書合考〉。

[64] 常贊春：〈跋傅青主篆楷二體蓮花經普門品〉，《傅山全書》，第7冊，頁5147。

[65] 李零先生指出《集篆古文韻海》中的許多古體字都是利用「鼎篆偏旁」拼湊而成。參見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載《九州學刊》，第3卷第1期（1988年12月），頁120。儘管二十世紀的考古成就使我們對戰國時期的古體字有了新的認識，但傅山那個時代的學者是缺乏這種認識的。

化領袖和學術權威的傅山，在結識了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這些來自當時學術重鎮江浙的學者後（閻若璩雖祖籍爲山西，但其學術的訓練則基本上是在南方完成的），才遇到了眞正的對手。傅山的學術興趣偏重在子學，在經史考證訓詁的專精方面，則不敵上述幾位南方的友人。[66] 和這些學者的直接交往，當然會促使他重新思考文字學上的一些問題。

對文字學的研究和異體字的書寫可能產生影響的另一個有關的學術現象便是清初興起的辨僞風氣。前面已經提到過，清初最大的一件辨僞大案便是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閻若璩所辨僞的雖是一部儒家經典，但他的工作對文字學乃至書法都有影響。因爲所謂《古文尚書》之所以稱爲《古文尚書》，就是因爲它被認爲是用古文書寫的《尚書》，不同於《今文尚書》。閻若璩在當時對《古文尚書》致命的一擊，動搖了許多人對傳世古文的信任。正如李零先生指出：「……清代以來，《古文尚書》辨僞的大案在當時造成巨大影響，加之考據學家們尊崇許學，他們不大相信《說文》外還會有多少眞正的古文流傳下來。」[67] 傅山如何看待當時關於《古文尚書》的討論，依然是一個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雖然這一討論在傅山在世時尚未全面展開，但閻若璩和顧炎武曾在太原就這一大案進行過論辯，對閻若璩的辨僞工作，傅山當然知曉。這一大案應也會促使他對古代文字的反思。

傅山當然不是沒有學問的人。儘管喜歡自誇的閻若璩在自己的著作中記載的都是傅山向他請教的事例，但他對傅山是相當欽佩的。他曾說：「文學中有如傅青主、顧寧人其人者，使後生小子，感奮興起，紹明古學，直追金

[66] 明清之際的山西，在學術方面是比較落後的。參見王尚義、徐宏平〈宋元明清時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佈及文化發展特點〉，《山西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頁49。清初山西的學術條件也遠非可以同當時的江浙相比。潘耒〈代人作重刻《漢紀》序〉云：「晉陽書肆之書，漫不足觀，民間又鮮藏本。」《遂初堂集》（康熙年間刊本），卷6，頁1—2。

[67] 李零：〈《汗簡》、《古文四聲韻》出版後記〉，見中華書局1983年宋郭忠恕編《汗簡》及宋夏竦編《古文四聲韻》，頁四。對傳世古文的懷疑還可追溯到清以前。如元代的吾丘衍在評價《古文四聲韻》時就說：「《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集字，初無出處，不可遽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參見吾丘衍《學古編》卷下，載盧輔聖、崔爾平等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第2冊，頁907。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華、嘉定諸先生之遺風。」[68] 但是如同我們在前面已指出的，同他複雜的思想體系一樣，傅山在學術和藝術上有著雙重乃至多重的性格。當清初的學術風氣變得日益謹嚴後，他的見功力的那一面開始展示出來，恣肆不羈的那一面或有所收斂。

下列兩個事例或可說明些問題。

第一個例子是傅山補書的《郭林宗碑陰》。前面已提到，傅山在康熙十二年曾應介休人士之邀，重書《郭林宗碑陰》。(圖15)儘管顧藹吉在《隸辨》中對傅山所補書《郭林宗碑》批評得很尖刻，[69] 但這並不能否認，傅山在書寫這塊碑時，是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來表現他對漢隸的理解的。傅山之子傅眉在談到此事時，曾說：

> 今行中郎隸書，惟汝帖「定册惟幕」數字及夏承碑耳。家君此書，蓋斟酌於二者之間。[70]

傅山也曾有一札，所談似和補書《郭林宗碑》一事有關：

> 前碑全無足存，只得一「鈍」字不失耳。無爲一字姑容一碑之理，求速磨之。且碑後原無落「蔡伯喈甫撰並書」之字，不知何故妄添此數字，大失漢碑之體。若傳之，遺笑海內，無了休矣。磨停當了，煩寄一聲，自有報也。切切。[71]

如果傅山信中所談是他人所書補此碑，他似不必如此介意，而是持批評態度即可。傅山之所以再三叮囑收信人將前碑磨去，是因爲他認爲書補《郭林宗碑》應盡量遵循漢碑的書法風格和體制，否則將「遺笑海內。」可見他對外界的評價是十分關心的。

[68] 閻若璩：〈與戴唐器書〉，見《潛邱箚記》，卷5，頁87b。根據閻若璩的記載，顧炎武對傅山在文字學上的造詣甚稱許，而閻則不以爲然。見《潛邱箚記》，卷5，頁50a—50b。

[69] 顧藹吉：《郭林宗碑》條：「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亦未見。《隸釋》云，凡歐趙錄中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今林宗墓側有一碑，乃近人傅山所爲，體即杜撰，跡復醜惡。無知者以爲中郎書，爭相傳拓，可笑也。」《隸辨》(乾隆八年刊本)，卷8。

[70] 同注[62]。

[71] 《傅山全書》，第1册，頁497。此札無題，但從內容來看，當和書補《郭林宗碑》有關。

另一個例子是傅山晚年書法的彙刻《太原段帖》。(圖16)《太原段帖》是傅山的學生段緈(字叔玉)彙集傅山晚年的一些書蹟刻的一部帖。段開始刻此帖時，傅山尚健在，因此，對段氏所選的內容很可能有所過問。[72]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部帖中未收一件篆書作品，而且整本帖中幾乎沒有冷僻的異體字。這似乎告訴我們，傅山在其晚年，在處理一些正式的作品(如刻帖和立碑)時是比較慎重的，動機大概也是惟恐「遺笑海內」。

那麼，傅山在其晚年是否還曾寫過有冷僻的異體字的作品呢？從筆者見到的作品來看，還是有的。這主要在他的草篆作品中。日本澄懷堂美術館有一件傅山書於晚年的十二條屏，內容爲其自作〈遊仙詩〉。最後三條屏即是想象力極爲豐富的篆書，其中最後一條爲草篆。(圖17)從今天文字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篆書中的一些字是頗成問題的。如第十一條屏第一行中倒數第三字字形爲一圓圈，中有四小圓圈。在這首詩中，此字讀爲「玉」字。[73] 這一字收在金代韓道昭在泰和八年(1208)修纂的《五音類聚四聲篇海》(簡稱爲《五音篇海》)中。此書「文字的異體和冷僻字，收載甚多，而舛謬亦夥。」[74] 在《五音篇海》中，此字寫作「圌」，注明讀音爲「玉」，但字義未詳。明末朱謀㙔在釋此字時云：「《溯原》：魚欲切，云未詳。㙔定爲古牧字、畜字，從此聲，外象籓牆，內所以分別牛羊也。」[75] 傅山將其寫成圓形並作「玉」解，似也自有其根據。古代的玉璧即爲有圓孔的玉器。傅山是否據此而將此字釋爲「玉」呢？

[72] 據段緈《太原段帖》自序，該帖始刻於癸亥春(1683年春)，二載告成。傅山去世的時間在1684或85年，因此他是知道段氏刻此帖的。同時，在《太原段帖》中也有傅山致段二札：「勞斤運醜字，當重邀武騎之榮，面謝不盡。賤名寫來三行，大小唯擇過之。末借重芳名，禮也。叔玉文兄。弟山頓首。」「儘此字排之石上，不必輒滿，寧橫勿順，在叔玉兄編排。山拜。」

[73] 傅山這一作品的前十條屏的詩題爲〈遊仙十首〉，見《傅山全書》，第1册，頁277-278。最後兩條屏爲〈贈陳十二首〉，見同書，頁278-279。《傅山全書》所收詩的文字與十二條屏中的文字略有差異。

[74]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頁216。《五音篇海》萬曆年間有重刊本，對明末清初人來說還是比較容易見到的。

[75] 朱謀㙔：《古文奇字》(萬曆年間刊本)，卷12，頁10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傅山的在最後一條屏上的題識頗值得我們注意。傅山這樣寫道：

> 吾友鄭四舜卿、李五都梁，致款於山長。更累爲斑斕[斕]之助，須此醜鴉介之。口占手信，眞不知詩爲何法，字爲何體。老髦率爾，回看自笑而已。傅山。

「老髦率爾」說明，這件作品書於傅山的晚年。但這段題識又告訴我們，此件作品是在友人請求下書寫的應酬作品。以書藝論之，在傅山作品中不屬精采者。⑯ 山長爲誰，不詳。但鄭四、李五不似有學問的學者。

後人所刻傅山《蕅頡堂帖》，也有傅山一些草篆作品，有些字甚怪異。其中〈劉連雲先生像贊〉一作，似爲其晚年作品。傅山在七十五歲時曾書〈不爲大常住勗哉之碑〉，⑰ 碑中亦有少數異體字，如「國」字書爲「囧」，「聞」書作「聲」，但數量很少，所用異體字並非極冷僻者。

我們可以見到的傅山最後一件有怪異的篆字的繫年作品，是其於甲子（1684）五月，亦即他去世前不久所書山西陽曲縣西村廟梁題記。根據張頷先生的研究，題記共三十四字，其中用古文書者十二字，用篆文書者一字，用楷體書者五字。住持以下姓名十六字皆用楷體。張頷先生認爲，在這件作品中，傅山書古文所據仍爲眞賡雜出的《汗簡》，在用字中也存在隨己意假借，在字形上加以附筆的現象，但卻有傅山自己一套文字學的思路可尋。⑱ 似不完全是不加甄別地從字書中挑出冷僻字來書寫。

上述幾個例子是否與筆者所言傅山晚年在書寫異體字時比較謹慎的假設完全抵牾呢？情況並非這樣簡單。首先，藝術與學術畢竟不同，在藝術領域中，想象的餘地可大些。同時我們也看到，晚明的遺風在清初並未完全消失。明末人對古文奇字的熱忱在清初的衰退，有一逐漸降溫的過程。其次，在應酬作品中，作者可依對象來決定自己書寫的內容和方式。如傅山所書〈遊仙詩〉和廟梁題記，都和宗教有關。書寫古怪難辨的篆隸，容易給宗教的場所

⑯ 傅山晚年的書法是比較老到的。筆者以爲此件作品的前十一條屏出自傅山的代筆傅眉或傅仁之手。最後一條則爲傅山所書。

⑰ 碑文見《傅山全書》，第1冊，頁447-448。太原市傅山碑林公園據傅山書法重刻此碑。

⑱ 張頷：〈山西陽曲縣西村廟梁傅山古文題記考釋〉，載《文物季刊》，1995年第3期，頁43－46。筆者以爲，傅山這些字的來源，很可能不僅只《汗簡》，尚有其它字書。

帶來一種神秘的氣氛。傅山爲道士，受道教影響至深。道教中有寫符傳統。傅山在書寫與宗教有關的文字中，相對地放蹤，人們似亦不以一般常情究之。再次，傅山在晚年書寫篆書時，似也盡量參入了自己對古文字的一些研究的心得。前引張頷先生的考證說明這一點。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清初文字學研究尚處於相當不成熟的階段。但傅山能將研究文字的心得融入篆書中，已多少反映出一種趨勢。

終其一生，傅山從未停止過書寫異體字。不過以筆者目前所見到傅山作品中使用異體字最多也最怪的篆、隸、行草作品，都書於 1650 年代（如書於 1651 年左右的《嗇廬妙翰》雜書卷、1655 年的篆書《妙法蓮花經》和 1658 年的隸書《千字文》），這難道僅僅是一個巧合嗎？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時至今日，還頗有一些傅山的作品散在世界各地私人收藏而不爲人知。筆者的上述假設也有待於今後新的發現來進一步驗證。

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傅山在晚年是清醒地意識到古體字中的問題的。最有力的證據是他本人在一首詩中的自白。傅山有失題七絕詩一首如下：

> 篆籀龍蠖費守靈，三元八會妙先形。一庵失卓無人境，老至才知不識丁。⑲

這首詩表明，傅山在晚年下了不少功夫研究古篆。「老至才知不識丁」一句雖有夸張的成份，但它至少說明，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傅山此時已明確意識到古代篆書系統的文字是極爲復雜的，他也越來越感到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和知識是極爲有限的。存世的一些傅山的研究筆記告訴我們，他在晚年對文字學和音韻學都很有興趣。他在討論文字時，經常引用許愼的《說文解字》。儘管清代對《說文解字》的研究要到十八世紀的下半葉才成爲顯學，⑳ 但傅山的筆記已反映出他的學術興趣和當時學術的某些趨勢的一致性。

⑲ 《傅山全書》，第1冊，頁266。

⑳ 林明波：《清代許學考》（臺灣：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叢書，19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初學術風氣的變化對傅山書法的另一重要影響便是傅山對碑學書法的宣揚。學術上的求本溯源和訪碑與研究金石風氣的形成，都促進了人們審美趣味的變化。巴克森達爾（Michael Baxandall）指出，人們的審美趣味在很大的程度上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珍視和運用的判斷能力有關。[81] 在傳統中國，書法本是文化精英們最爲珍視和喜愛的藝術，[82] 它亦因此與學術思想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當樸實的學風在學術思想領域中受到崇尚後，先秦和秦漢的古樸書風亦開始爲清初一些書家所激賞。學術思想界的領袖人物爲考證經史而提倡金石學，他們的好尚無疑促進了書家們對古代金石書法的重視。當時熱衷於古代篆隸的書法家們和金石學的領袖人物有相當直接的交往。[83] 在金石文字受到尊崇的大文化環境中，頻繁地接觸金石文字，使清初的書家對金石文字有了更爲深切的感受和敏銳的判斷力。殘碑斷碣上剝蝕而古樸的文字向他們顯示了雋永的魅力。臨習篆隸在此時不但漸成風氣，而且出現了像鄭簠那樣專攻隸書的書法家。[84] 在清初的書論中，討論篆隸的文字也明顯地多於前代。傅山在論述書法時，把學習篆隸作爲書法藝術的不二法門。他宣稱：

> 不作篆隸，雖學書三萬六千日，終不到是處昧所從來也。[85]
>
> 不知篆隸從來而講字學書法，皆寐也。[86]

[81] Michael Baxandall , *Patterns of Intention:On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Pictur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34.

[82] Lothar Ledderose,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of the Elite. "In Irving Lavin ed., *World Art: Theme of Unity in D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Pe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vol.2, pp.291-294.

[83] 如隸書名家鄭簠就同顧炎武有交往。參見王弘撰：〈寄鄭谷口〉，《砥齋集》（康熙年間刊本），卷8下。

[84] 現存鄭簠作品，除少數篆書作品外，幾乎均爲隸書作品。參見何傳馨：〈清初隸書名家鄭簠〉，《故宮文物月刊》，第8卷，第8期（1990年11月），頁130—137。

[85] 陳玠：〈書法偶集〉，見《屏廬叢刻》（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天津金氏刊張壽鈔本），頁5b。

[86] 《傅山全書》，第1冊，頁853。傅山討論學習篆隸重要性的文字頗多，參見《傅山全書》第1冊，頁519，855。

傅山以極其簡潔明了而又雄辯有力的文辭把古代篆隸書法在書法創新中的作用發揮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的書論也因此最典型地反映了清初書家對篆隸的新認識。

以學術成就和對清代學術的影響而論，傅山是不及顧炎武和閻若璩等人的。[87] 但就書法而言，傅山卻是山西學術圈中對清初的書法貢獻最大的一位。朱彝尊雖也是一位值得重視的清初書家，但影響不及傅山。傅山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本人在世時就已被認爲是清初重要的隸書書家之一，[88] 更重要的是，在清初學術思想風氣轉變之際，他以獨特的敏感，鮮明地提出了學書必須通篆隸之變的觀點，直開清代碑學思想的先河。他本人的書法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當時學術思想的影響。因此，研究兼學者和書家於一身的傅山，也就成爲了尋繹清初學術思想變化對書法藝術影響的最理想的切入點。

每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風氣都會給那個時代的書法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但比較起來，清代書法和學術思想有著更爲直接和密切的關聯。而這一關聯又是由清代書法的特點決定的。清代書法區別於前代書法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以二王書法爲正統的帖學壟斷中國書壇一千餘年後，碑學在清代崛起成爲二王傳統外新的書法範示（paradigm）。碑學本身就是一個和金石學、文字學息息相關的藝術運動。沒有清代樸學作爲一個文化背景的話，碑學也是不可想象的。乾嘉時期，寫小篆成風，是和當時以段玉裁、王筠等爲代表的《說文》研究分不開的。清末吳大澂、黃士陵、吳昌碩等頻繁地書寫金文，和當時研究先秦文字的進展（如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不無關係。書法

[87] 楊向奎先生在〈傅山學案〉中，高度評價了傅山在清初思想史上的地位，但也指出：「先生（筆者注：指傅山）究係陽曲人，遠離於當時經濟文化俱發達的江南地區，在學術上，比如在他經常提到的文字音韻等方面，他還沒有找到門徑，未入門當然談不到深造，可與顏元李塨等齊，與江南諸老黃顧相比，陋且鄙矣，與其同鄉晚輩閻若璩比，更瞠乎其後，非不能也，環境使然，個人的力量終難突破地域間的封鎖。」見《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85），第1卷，頁79。楊先生對傅山的這一評價，似有失偏低。

[88] 朱彝尊〈贈鄭簠〉一詩列舉清初著名隸書書家時有「太原傅山最奇崛，魚頡鷹時勢不羈」句。見《曝書亭集》，卷10。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書法的發展和學術的研究密切相關，成了清代書法發展的一種模式。本文對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山西學術圈對傅山晚年學術活動及書法的影響的分析揭示出，這一模式在清初就已基本形成。康熙後碑學的逐漸形成和乾嘉時期碑學的鼎盛，都是這一模式合乎邏輯的展開。而傅山對這一模式在清初的形成是有其獨特的貢獻的。

**本文最初爲提交 1994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中國常熟舉辦的「中國書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與會學者曾給予筆者許多寶貴的意見和鼓勵。汪世清先生亦對拙文多所指教和鼓勵。芝加哥大學王強兄也曾就明清思思想史上的一些問題賜教。1996 年夏筆者在太原做研究時，又得與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姚國瑾兄交流研究傅山的心得，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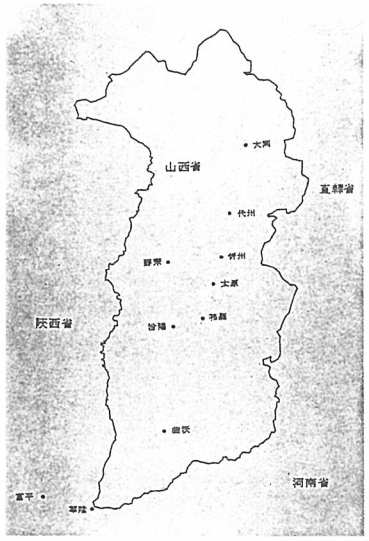


圖 1　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山西學術圈主要成員在山西境內活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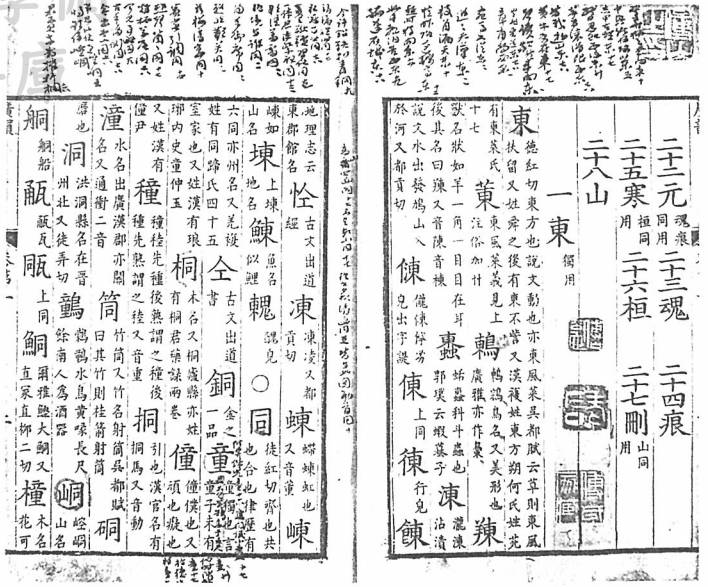


圖 2　傅山批注《廣韻》北京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君諱全字景完
敦煌效穀人也
其先蓋周之胄

圖 3　王弘撰舊藏《曹全碑》拓本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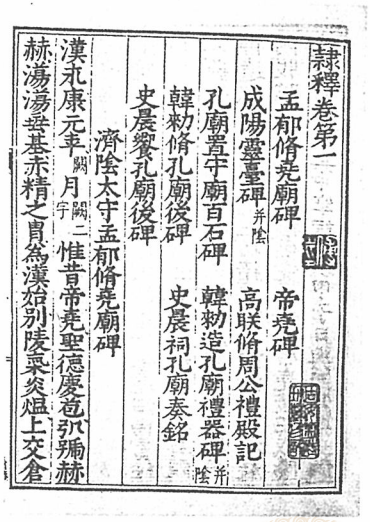

隸釋卷第一
孟郁脩堯廟碑　帝堯碑
成陽靈臺碑并陰　高联脩周公禮殿記
孔廟置守廟百石碑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韓勅脩孔廟後碑　史晨祠孔廟奏銘
史晨饗孔廟後碑
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
漢元康元年闕月闕二惟昔帝堯聖德慶迄弘殤赫
赫湯尋基赤精之胄為漢始別陵粟炎烜上交倉

圖 4　經傅山校勘和批注的洪适《隸釋》萬曆年間刊本　藏者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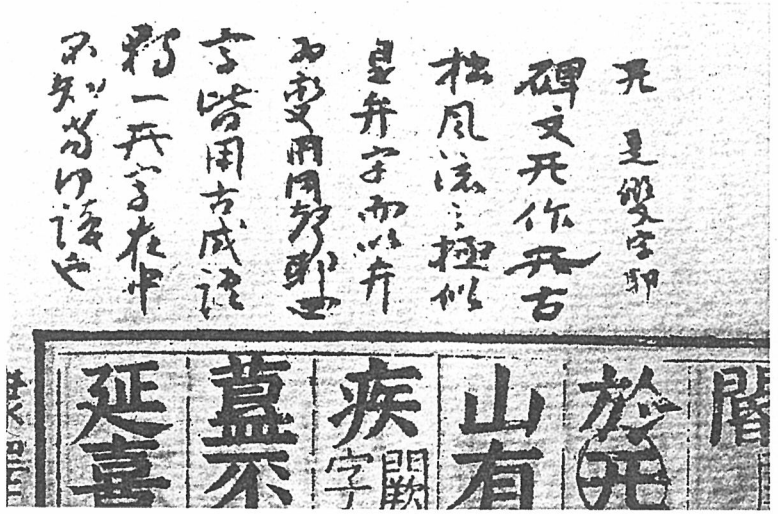


圖 5b　傅山批語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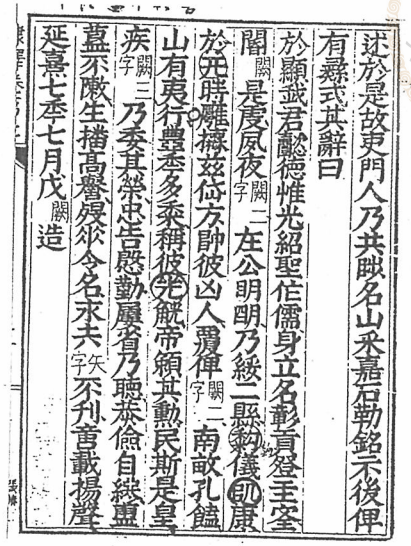

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瞰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
有彝式其辭曰
於顯武君懿德惟光紹聖佐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
闇闕是庳夙夜闕二在公明明乃綏二縣勤儀飢康
於元時雕褥茲位方帥彼凶人覆俾闕二南敢孔饒
山有夷行豐季多乘稱彼元戴帝領其勳民斯是皇
疾闕三乃委其榮忠告慇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緻盡
嘉不敗生播高譽殞烝令名永夫矢字不刊言載揚厥
延熹七季七月戊闕造

圖 5a　《隸釋》中《泰山郁尉孔宙碑》碑文上傅山批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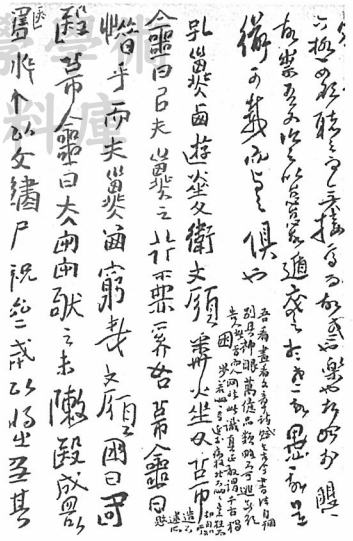

乳嫠面遊峯爻衛文須秉艸火坐又甘帀
金皿曰吕夫嫠之北采采芣苢芣苢金皿曰
婚于而夫嫠面窮裁文須國曰哥
酳芣苢金皿曰大兩面臥之未徹酳成鬯

圖 6a　傅山雜書卷《兔盧妙翰》行書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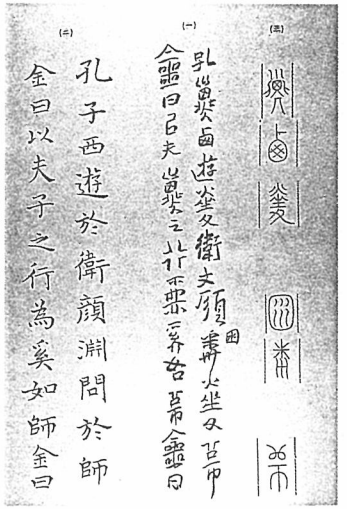

(一)
乳嫠面遊峯爻衛文須秉艸火坐又甘帀
金皿曰吕夫嫠之北采采芣苢芣苢金皿曰
(二)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於師
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
(三)

圖 6b　傅山雜書卷《兔盧妙翰》行書部份局部之比較(一)傅山書「孔子西遊衛，顏淵問於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二)傅山行書的楷書原文；(三)傅山行書中所用的異體字的一些古文原型。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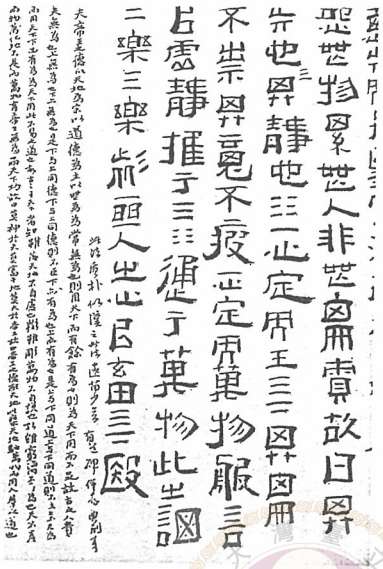


圖 8　《啇廬妙翰》隸書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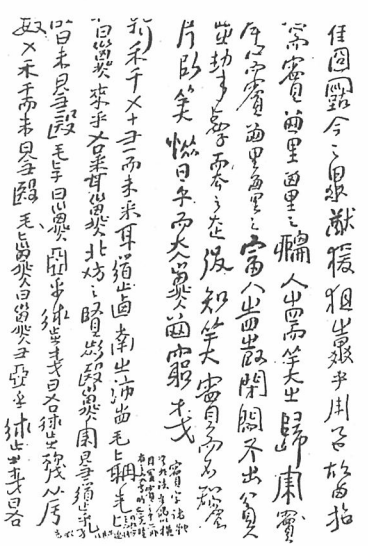


圖 7a　《啇廬妙翰》中有傅山臆造賓字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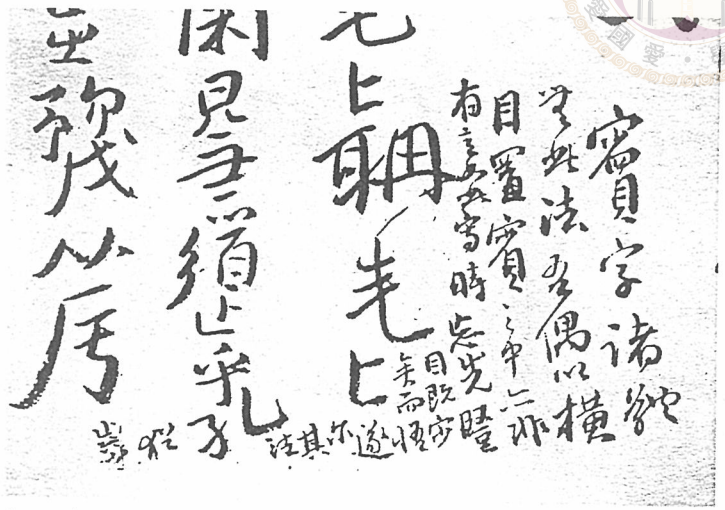


圖 7b　《啇廬妙翰》中傅山的批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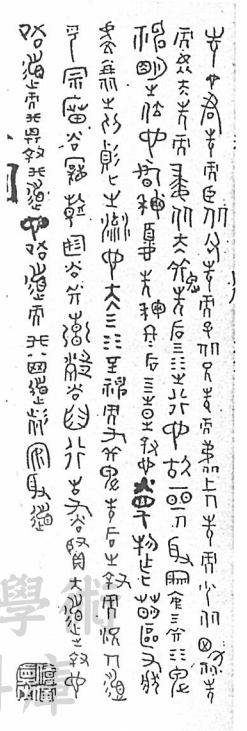


圖 9　《啇廬妙翰》篆書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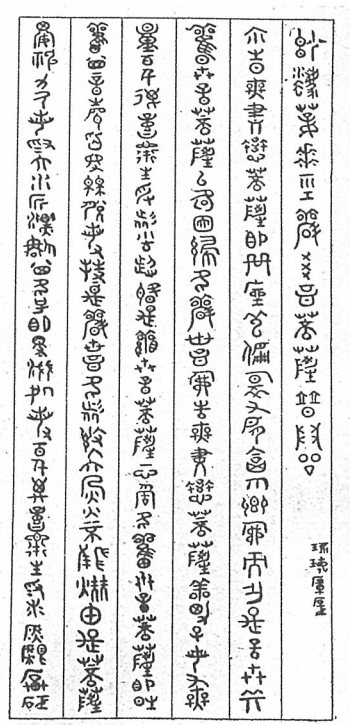


圖 10　傅山一六五五年篆書《妙法蓮花經》冊頁　藏者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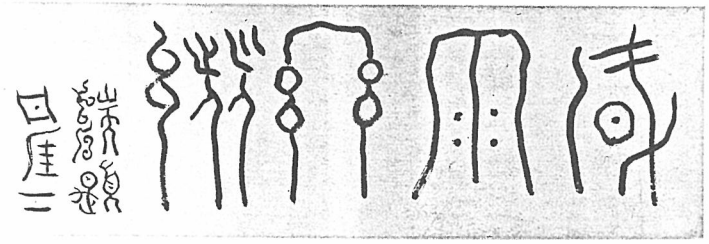


圖 11a　北宋燕文貴山水卷上傅山所作篆書引首　大阪市立美術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1b　傅山篆書引首名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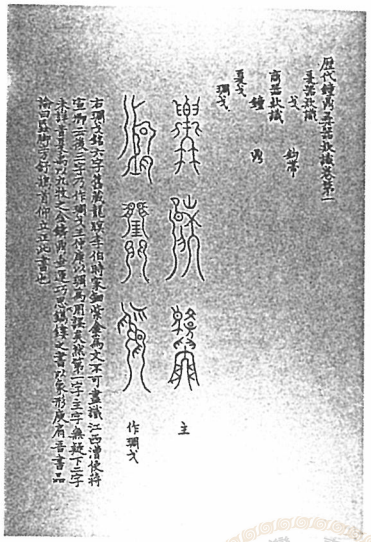


圖 12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著錄所謂夏戈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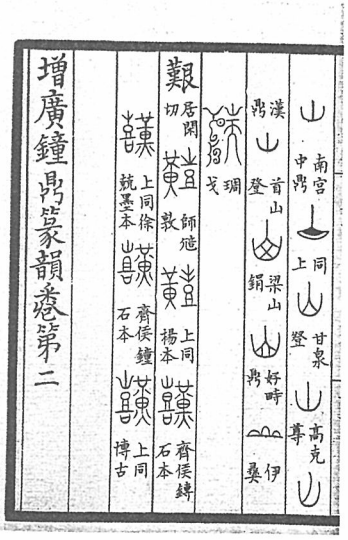


圖 13a　元楊鈲編《增廣鐘鼎篆韻》有「山」字一頁



圖 13b　《增廣鐘鼎篆韻》局部



圖 14　宋杜從古編《集篆古文韻海》有「使」字一頁



圖 15　傅山重書《郭林宗碑》拓片



圖 16　傅山晚年書法彙刻《太原段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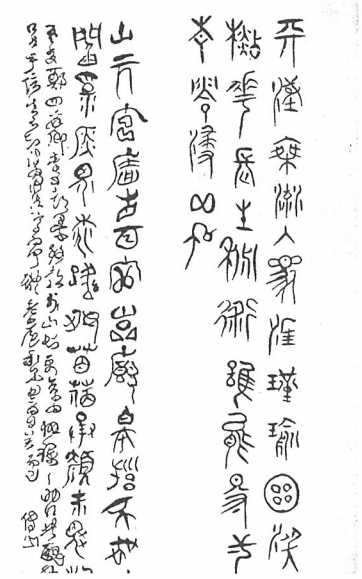


圖 17　傅山書「遊仙詩」十二條屏之最後兩幅　日本澄懷堂美術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